



熔炉烈火

——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

工人出版社

熔 炉 烈 火

—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

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編委会編

工 人 出 版 社

• 1965年12月北京 •

封面設計 魯 人
插 图 于紹文

熔 炉 烈 火
——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
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編委会編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）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9 号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37,000·印张：2·印数：1—118,000

1965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007·79

定 价：0.18 元

目 录

四百块钱 血腥起家.....	1
童工血泪.....	2
烈火旁熬煎.....	6
“催命料”.....	9
用不着一脚踢开.....	10
坑人局.....	12
吃的猪狗食.....	15
穿的麻袋片.....	18
“份子掌柜”.....	21
豺虎同行.....	23
蛇狼宴会.....	28
被榨尽血汗之后.....	31
一笔血账.....	34
熔炉怒火.....	36
第一次伸直了腰板.....	38
跟资本家算剥削账.....	42
反击.....	47
太阳照在熔炉上.....	51
红花满炉开.....	55

四百块钱 血腥起家

哈尔滨元吉玻璃厂，在这黑龙江省一带，远近闻名。这个厂从一九〇七年开办到现在，已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了。

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后，清朝皇帝丧权辱国，和英、法、美、日、俄等帝国主义国家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就在这时候，沙皇俄国的将军和商人们，象蝗虫似的大批大批地涌进松花江畔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来。这些酒鬼们，用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钱，盖起精致的洋楼，花天酒地地酗酒享乐。那时市内还没有玻璃厂，平时不大显眼的酒瓶子，一时竟成了缺货。

早年来往于哈尔滨、海参崴之间搞投机买卖的刁羽翎和他兄弟刁忠堂，靠捣买盗卖弄来的钱，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开设了一个元吉号粮庄。这时，这兄弟俩一瞅酒瓶的买卖这么好，就从粮食店里拿出四百块钱，在道外西门脸这地方，开办了元吉玻璃厂。

那时才只是一个小厂房，两个“小鸡蛋缸”。这缸的形状，两头尖，中间鼓，形状很像个鸡蛋，所以玻璃工人给它取了个外号，叫“鸡蛋缸”。刁羽翎就以这一点点资本，卡着工人的脖子，喝着工人的血，发起家来。

在那苦难深重的年月里，玻璃工人中间，流传着这样一

首歌謠：

提起玻璃匠，終生苦難忘。
打保進元吉，三年苦水熬，
摸黑三更起，身披破衣裳。
干活沒鐘點，累的痛斷腸，
睜眼就挨打，燙死活遭殃。
冬天爐里睡，夏天地上躺，
个个打光棍，窮的剩鞋幫。

這歌真是一個字，一滴血，繪出了當年在資本家的血腥壓榨下，玻璃工人的一副悲慘仇恨的生活畫面。

童 工 血 泪

在這玻璃廠里，首先受到最殘酷剝削的就是童工。

刁羽翎在最初開玻璃廠的那一年，僱了二十來個工人，其中十三四歲的童工，就占十五六個。從一九〇七年辦廠，到一九四六年哈爾濱解放，這長長的四十年，每年這個廠僱的童工，都在三分之二以上。有一年老師傅全被辭退了，就剩了五十多個童工干活。童工替他沒黑沒夜地干一天，只得一毛一分六厘錢的報酬。說是每天一毛一分六，月月還拿不着錢。童工們要支個塊兒八角的，求了工頭，又求賬房，到頭來錢支不出，說不定還要挨一頓鞭子。

黑心腸的資本家,就象一只喂不飽的豺狼,吃了人,連骨头都不吐一根。

這姓刁的資本家還立了這麼一條規矩:收童工,家在哈爾濱的不要。他要的,是那些無依無靠,在關里被地主逼得走投無路的窮莊稼人的孩子。除了這條,還規定:到元吉來



童工每天睡四個來鐘點,就被工頭用鞭子抽起來。

当童工，在厂里有认识人的，只要一家铺保。无亲无故的，要三家殷实铺保。不满三年不准走。要走，一个铜子不给，还得包付三年的伙食钱。穷人家的孩子来当童工，都是被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逼的没活路了，才投这条苦道，穷的光着屁股都没裤子遮，哪来的钱给资本家包付伙食呢？明知是火坑，也只得闭着眼睛往里跳。

资本家刁羽翎还叫工头特制了一根皮鞭子，用来专门管童工。

这鞭子是用两条两尺多长的胶皮缝起来的，中间用细电线捆上。这鞭子打起人来，就象针朝肉里扎一样。

童工每天早晨两点多钟起床，有时到晚上十来点钟才干完活。正当发育成长的年青人，每天就睡这么四个来钟点，哪有个不困的？刁羽翎每天临到睡觉了，还忘不了招呼工头：“记着到时候把这些小兔崽子喊起来，别误了干活。”

看东家眼色行事的工头，不用刁羽翎嘱咐，他也懂得怎样替他的主子效劳。见天三星未落，工头赵士丰就披着衣服，站在草棚门口大着嗓门喊：“看啥时候啦，还不快起来上工！”

孩子们头晚干到大半夜才下工，这才刚躺下一小会，一个个睡的正熟哩，谁也没听见工头的喊声。赵士丰走到厂房溜了一圈，看还没有半个人影进来，他提起那根特制的大皮鞭，闖进草棚，不由分说就唰唰地乱抽一阵，尖着嗓子骂：“小兔崽子，看你们还贪睡不贪睡！”

老工人王永利那时才十二岁。有一天他拿瓶子没拿稳，摔到地上砸碎了几个。在玻璃厂，摔坏几个瓶子，这本

来不算个啥。可那年月，誰把童工当人？晚上九点过了，王永利累的腰酸背痛，刚爬上吊鋪，钻进被窝躺下，工头赵士丰凶神恶煞地闖进来，掀开被窝，一把把王永利拉下鋪来，連問都沒問，举起皮鞭，一連抽了四十几鞭。打的王永利直在地上滾。打完之后，又狠狠地罵道：“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摔坏瓶子？”十二岁的王永利，滿身被打的青一块、紫一块，第二天天沒亮，又被工头逼起来干活。

这一年中秋节，一早，刁羽翎放出話來說：“今天八月中秋，小兄弟都加把劲，早点把活干完，好洗洗脸，上江沿遛达遛达去！”

一听这話，关进籠子里的童工，心都喜开了花。外人不知道，这元吉玻璃厂的資本家，对童工还立了这么一条規矩：进厂三年，不准上街。怕的是孩子玩花了心，耽誤了干活。这天东家放話，叫上街遛遛，那不比过年还乐？小童工們干完了炉上的活，又給炉上抬完煤，忙到下午五点，才算搞利索。洗把脸，吃完饭，都上大街玩去了。

工头赵士丰一看表，六点过了，还不見这些学徒回来，罵道：“这些兔崽子，一放出去就回不来了。”拿着那根大皮鞭，坐在大門洞里守着。沒过一会，这些小学徒，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老工人徐士安还記得：他第一个进門，前脚刚跨进大門洞，劈面就挨了一皮鞭。上街的四十多个童工，进来一个，打一个，个个都挨了狠狠的一皮鞭。

在那个世道里，童工有理无理，都得挨揍。老工人尚鴻业說：“那时我一听喊起床，心就吓的直跳，不知道这一天，又要挨多少次打呢？……”

烈火旁熬煎

那一座座料液翻騰的熔炉，溫度高达一千三百多度。還沒走近炉門，热呼呼的料液，就烤得肉痛。那年月，这姓刁的資本家，把工人的血榨干了，他还嫌不够哩，那肯拔出一根錢毛来改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。日日夜夜，工人就在这高溫炉旁，忍受着烟熏火烤。

那时候，燙伤、烧伤、受热过度，当场昏倒的事，天天都有。燙伤了，热昏倒了，工头还气凶凶地跑过来問：“喘气不喘气？能喘气，就得給我干！”

有一天天挺冷，刚滿十一岁的小童工郭万义两点来钟就被工头喊起来上工。走进車間，又是蒸汽，又是烟熏，弄的人都睜不开眼睛。当时一个老师傅站在炉前挑料，郭万义正要过去开模，迷蒙蒙地看不清，一块火紅的料液，正碰在郭万义的左眼皮上。这幼嫩嫩的眼皮子，不說碰在那一千多度的料液上，就是随便碰在这炉旁的哪一件滾燙的工具上，不燙烂，也得燙肿。这孩子燙的尖叫一声，就昏倒过去了。炉上的工人，忙拿着碗，化盐水，替他洗燙伤的地方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姓王的工头走了过来，一边分开众人，一边說：“干活去，干活去！看什么？”

他瞅了瞅躺在地上的郭万义，假仁假义地問：“你看，咋不小心哩？上药了沒有？”

沒等別人回話，接着又說：“下回小心着点。弄布包包，

快去干活吧！”

郭万义說：“我眼都睜不开，咋干呢？”

“咋干？你那只眼不是沒燙嗎？”

不干吧，命捏在人家手心里，想跑也跑不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只好吞下眼泪，忍着痛，一只手捂着烫伤的眼睛，又去干活了。这不是干活，这是叫资本家、工头逼着去卖命呵！

学徒王永利，好不容易熬到“出师”了，有天，他肚子痛。还得站在炉前，拿着一根挑料杆，往模里放料。豆大的汗珠，雨点似的从头上淌下来。肚子痛的实在挺不住了，他才放下挑料杆，蹲在炉前歇会儿。那天正生产三斤重的大酒瓶子，一个工人从炉里挑出一块三斤重的火烫火烫的料液，正要往模具里放，刚把料杆一举，誰知料沒挑稳，唰一下象团火球似的掉在王永利的褲子上了。那条破褲子，立刻着火了。大伙一看，連忙打了一桶水，朝王永利的褲子上泼。火灭了，那块通紅的玻璃料也掉下来了。王永利的半个下身，却燙的皮开肉裂，鮮血不住地直朝外冒。人燙成这个样子，大工头赵士丰走来一看，还問：

“能干活嗎？”

平时不敢讲话的小徒工，也被这句黑心話問的气憤了，七言八語地說：人都燙的不能动弹了，还怎么去干活？

赵士丰一看众人的气憤情緒，这才沒敢再逼下去。

一連半个来月，王永利躺在床上，身都翻不了。沒有药治，每天就弄点盐水洗洗伤口。这伤口一沾上盐水，簡直痛的钻心。整个下半身都化脓了，小便燙烂了，每回尿的都是血。一躺躺了个把月，才能慢慢撑起来走道。他去找賬房

想支点工錢，賬房沒好声气地說：“躺着还要錢？东家說啦，歇工不开工資。”

資本家的心，就是这么黑。

那么强的高温作业，夏天連个凉开水都不給預备一点。老师傅自己挑块玻璃料，吹个尖头尖脑的玻璃罐，装一罐子凉水放在手跟前喝。这罐子的外形，活象个尿壶，大伙苦笑着給它取个外号，叫“尿甃子”。一罐凉水，也解决不了問題。暑期一到，人人热的气都喘不过来。一天的活干下来，每个人的脸，跟死人脸一样煞白焦黄。

苗永敏已經是个十八、九岁的棒小伙子了。两筐煤，一百几十斤重，不費劲地就挑起来了。有一次，他在炉前干活，先是汗水象下雨一样，把披在身上的一条麻袋片，浸的透湿透湿。脸上象火烧似的，紅的透亮。跟着脸色由紅发黄，泛白，全身一陣凉，热昏过去了。昏倒以后，工头給他头上泼一盆凉水，刚醒过来，又催着他去干活了……

夏天的日子难熬，冬天来了，也不好过呵！資本家只顧从工人身上榨取血汗，哪管什么設備。一个厂房，上边一片鉄皮屋頂，周围就弄点板子隔一隔。有的老工人坐在炉前管开模，开模这活是坐着干的，面前是座大熔炉，烤的火痛，身背后就頂着破板墙，北风一刮，大朵的雪花都从板縫里钻了进来。冻的受不了，只好弄块破麻袋片披在背上。因为没有棉鞋，一对脚后跟冻的象烂梨一样。

“催命料”

元吉玻璃厂的工人，都把“回头料”叫“催命料”。这又是刁羽翎盘剥工人的一个绝招。

什么叫回头料呢？

那时这玻璃厂用的“小鸡蛋缸”，已由两个，发展到四个。虽说是四个缸生产，每个“小鸡蛋缸”还只能熔化一百五十斤玻璃料，四个缸合在一起，大不了才六百斤。可那时候全厂的三十多人，每天两点多起床，下晚八九点还完不了活，被这四只小缸拖的团团转。原因就在这“回头料”上。因为工人刚干完头一缸料，工头就赶着把这只空缸，又下上了料。等工人干完最后一只缸时，头只缸的新料，又熔化好了，成了连轴转。

这刁羽翎每天天没亮，就戴着黑缎子瓜皮帽，扶根黑漆手杖，一盘炉一盘炉地挨个儿看。一看工人把第一个缸的料使完了，去干第二个缸的活儿的时候，他就招呼工头说：

“大兄弟呀，这缸空出来哩，快投上半缸料吧！”

工头一听，就瞪起横眼珠子骂起下料工人：“你是死人啦！没看缸在空着肚子？还不快把料下进去！”

工人累的腰酸骨痛，衣服被汗水湿的拧得下水来，刚把最后一缸料干完，好不容易才能喘口气，回头一看，那才干完的几只“小鸡蛋缸”里的料，又是满满的……

工人的血汗，把资本家刁羽翎的胃撑大了。到一九二

五年前后，又扩充六只缸，两座元炉。生产能力，整整翻了四倍半。

换了大缸，刁羽翎照样下“回头料”。真是一块玻璃，一片血。

有个叫赵福昌的老工人想：再这样干下去，一条命就要拖进去了。他跟同伴商量，要走。

“上哪去呢？”

他听说长春也有玻璃厂，兴许那里要好些。就说：“上长春。”

他省吃俭用，攒下了二十几元钱，第二天买了一张车票，偷着上了长春。到长春一看，嗨，天下资本家的心一样黑，那边玻璃厂的老板，跟刁羽翎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，工人想支点工钱，连块儿八毛都不给，一次只给个三毛两毛的；可是干起活来，恨不得叫你一天给他干二十四小时！不得已，只好又回到元吉来。

用不着一脚踢开

那年月的玻璃工人，干着这么苦的活，还提心吊胆，就怕东家请“吃元宵”。工人管这叫“吃滚蛋丸”。

头年腊月，工人没日没夜地生产出来的酒瓶、煤油灯罩，一筐压一筐地堆满一院子。年三十停炉。正月十五，资本家照例把工人“请”去吃一顿元宵。吃过元宵，不用问，回来就得夹起破被卷，拍腿出门。

可是元吉玻璃厂的资本家刁羽翎，做的比这更绝。

一九三〇年，是元吉玻璃厂大发展的一年。这一年春天，他又新修了能熔料七吨多的一座大池炉，秋天开炉生产，雇佣了一百八十多名工人。连干了四个月，产品堆的象一座小山。刁羽翎一想：这些产品够卖半年了。留着—百八十几号人到来年正月半，不说工钱，光粮食得吃多少！腊月初七那天，玻璃工人累死累活干到晚上九点多。第二天腊八一早，刁羽翎就突然宣布停炉刷人。

临到把工人赶出大门，刁羽翎还要在工人身上捞一把。那时还用铜子，一块换十吊。可是铜子，份量重，谁都不喜欢要它。上钱庄，用九毛钱的钞票，就能换回一块钱的铜子。刁羽翎自己也开着一座钱庄，他打发账房上自己的钱庄去用九折换回了几麻袋铜子，按一块顶一块，给解雇的工人开工资。

一百多工人，前前后后来到了账房。刁羽翎亲自坐在账房柜上，给工人发钱。该开支二十块的，给十二块钱的钞票，八块钱的铜子。这么一折腾，又在每人身上，刮去块儿八毛的。

司炉工人张培兰、王大汉、尚怀雨，都是在元吉多年的老工人，他们的血汗都快被刁羽翎吸干了，现在用不着了，就把他们一脚踢开。当他们夹着一床破被子，走出大门时，刁羽翎还从屋里赶出来，假惺惺地说：“这是不得已的呵。买卖不好，东西没人要。等来年买卖好点，再请你们回来。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嘛！”

张培兰走出大门，问王大汉：“咱们上哪去哩？”

王大汉苦笑一下：“还有什么地方可去？”他用手朝对門一指：“蹲小店唄！”

蹲小店，这小店也是資本家老刁家开的。他用开玻璃厂剝削来的錢，买了这座客店。为的就是“接待”这些被他赶出厂門的失业工人，讓他們在玻璃厂拿的工資，原封不动地交給小客店，再回到他的口袋里。

大年三十的这一天，都快十点了，张培兰、王大汉、尙怀雨三个人，还縮在一条破被子里下不了炕。外面下着鵝毛大雪，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，把这小客店的房間都冻的象个活冰窖。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袄，再也沒有第二件能抗寒的东西了。碰上这样的天气，別說不能出去找零工卖，連大門都出不了。

王大汉一看，不行呵！再不起床，下晚飯店关門过年了，大年初一連飯都沒得吃的。

大年三十，資本家刁羽翎全家老小，儿子儿媳，侄儿侄女，鬧哄哄地围在紅漆圓桌上，吃魚吃肉，放鞭炮送年。王大汉、尙怀雨三个人，縮着冻得发抖的身子，冒着門外的紛飞大雪，拿出身上仅有的几毛錢，买了二十多个苞米面窝窝头回来……

坑 人 局

資本家刁羽翎，不过腊八就把大批工人解雇了。侥幸留下的人，工資也被打了个二八扣。就是剩下的这一点点

錢，也在工人口袋里裝不熱呼。

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飯，會計刁鳳山就招呼起來了：

“大伙來呀，少東家陪你們推牌九啦！”

這一招呼就是給你個訊。好玩牌的得去，不好玩牌的，也得去湊個熱鬧。

老工人楊林棟吃罷年夜飯回來，走回宿舍，躺在草棚的吊鋪上，難過的半天沒言語。他想着在山東老家的娘呵！這北風呼號，遍地冰雪，娘這時是餓着肚子？還是喝上了一碗苞米糊糊？

這時，刁鳳山一頭鑽了進來，笑嘻嘻地拉起他就往外走。

“啥事啊？……”

刁鳳山一邊拉着他走，一邊說：“好事！好事！推牌九，推牌九！”

楊林棟跨進賬房門朝屋里一瞧，電燈底下的大圓桌旁邊，已經站滿人，他畏畏縮縮地說：“我沒錢吶！”

“沒錢好說。”刁鳳山把他朝桌邊一推：“賬房借支，賬房借支。”

這少東家叫刁家義，是刁羽翎的二兒子。他穿着一件青緞藍花的狐皮短祆，一邊洗牌，一邊嚷着：“誰押？誰押？要發牌啦！”

幾個工人，有押一塊的，有押三、五毛的，滿滿的一圓桌，押了二十多份。楊林棟從口袋里摸出唯一的那十塊錢，拿出兩塊，把剩下的八塊，又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，裝回口袋。他不敢多押，只押了兩毛錢。